

文化自信与“二为方针”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三）

陈众议

内容提要 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自然广受学界关注。但同时，某些褊狭的理解也随之产生，譬如将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国学”，从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拟从世界文学一远一近两种文艺现象出发，辨正文化自信的一个维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后者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而且历久弥新。

关键词 文化自信 二为方针 复数国学

先说“国学”，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它“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自‘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它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①。以上是目下比较概括的说法，也是比较普遍的认知。然而，考“国学”一词的由来，则要追溯到晚清民初的反清复明思想，它延讫了传统意义上的华夷或夏夷之辨。“五四”以后，这种狭义的“国学”遭到重创，以至于出现了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乃至汉字的极端倾向。作为反弹，“国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再度“复兴”；但迅速遭到第二次围剿。郑振铎先生是其批判者之一，称“国学”是不分文理地胡子眉毛一把抓，或者不知深浅地回到“四书五经”一类的劳什子。在他看来，后者所指涉的国学无非是中学国文课的夸大和对国文老师的抬举。^②

总之，以上所说的这个“国学”主要指汉学，而且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学。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自信当然不能局限于汉学。首先，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而少数民

^①《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22页。

^②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载《小说月报》20卷，1929年1号，第9-10页。

族文化自然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在新全球化时代，并且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在美欧日抬头的前提下，复数的“国学”才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复兴诉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谓复数的“国学”，则既包括上述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国学”，也包括指向整个中华文化大家庭的大复数“国学”，甚至还应包括中国与不同国家关系的更大的复数“国学”。这也是文化比较、文学比较和文学翻译赖以存在的根本因由。

—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应包括中华民族吸收并转化的优秀外来文化。其中，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化入至关重要；尤其是后者，盖因她是我党的指导思想。而狭隘的“国学”无疑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或者反之，即固步自封的夜郎自大。历史上，中华民族最强盛的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最自信、最开放、最包容的时代，譬如从文景之治到开元盛世再到咸平之治、永乐之治和康乾盛世。但机会也是稍纵即逝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定力和自信而不自大的文化定力，几十年得来的盛世有可能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固非简单的从古，自然也不是简单的从洋。一切盲目的传承和拿来都不可取。且说由于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外国文学界在解放思想、推动变革的伟大实践中功不可没，但其中泥沙俱下、来者不拒的鲸吞现象也确实存在。这里本应有一个了解的需要（多多益善）和拿来的慎重（取舍有度）问题。它决定了文化比较、文学比较和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即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而事实是，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推崇的文学经典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中淡出了我们的视阈。于是，当代比较文学的天平明显倾斜：左拉战胜了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了托尔斯泰，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穆时英、废名战胜了鲁郭茅巴老曹。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村上春树战胜了大江健三郎，阿特伍德战胜了门罗，郭敬明战胜了莫言。这里既有市场因素、资本的作用，也有学术的偏颇。

因此，重估经典，也许是当前比较文学和整个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盖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降，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袁可嘉指现代主义语）以及绝对的相对主义使文学批评明显转向了重器轻道。换言之，所谓的“文学性”追寻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加引号的“反政治”和“淡化意识形态”所彰显或蕴含的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意识形态。只消看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便不难窥见其政治偏见，譬如认为鲁迅、茅盾们是意识形态化的，而张爱玲、周作人们才是注重

文学性的。当然，后者以及左拉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甚至村上们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尤其是在和平年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年代。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后者主导了一国、一族的文学史，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答案不言自明。但是，诸如此类并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如何保持足够清醒的甄别能力、足够明智的比较和取舍方法。

此外，我国古来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我们对曾经的全球化和中国主导的新全球化持何态度，在国家消亡之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准则不会改变，也不应改变。这也是文化比较、文学比较和文学翻译的基本出发点。在此，我想援引厉以宁先生最近在谈到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时说到的三大要素，即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缩小贫富差距。然而，需要补充的一个要素是狭义的文化思想。大到核心价值观，小至庸常生活，文化思想决定民族素质；同时，它也事关中国学术能否心系国运，并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同心圆。毫无疑问，人类需要同心圆，国家需要最大公约数，文学比较、文化比较也需要同心圆，既有内核，又有外延；既有主次，又有交叉。文学翻译更应有甄别，有取舍。如是，我们会不由得想起习近平同志“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之谓——我称之为“三来主义”。

二

回到外国文学本体，众所周知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也许是我们反证文化自信和复数“国学”的两个适例。且不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我国维新变法以降的文化和文学有多大影响，即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小小的文学思潮，其在我国当代文坛所产生的反响也勿容忽视。然而，这里所讨论的主要不是这些域外文明或文化成果对我们的影响，而是其中所蕴藏的“古为今用”“东为西用”“他为我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毛主席提出的“二为方针”正在为新时代所发扬光大，但她也曾极大地受惠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①正如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

^①毛泽东同志于1964年正式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但梁启超等维新派先贤关于后者“托古喻今”或“托古改制”的说法众所周知。这种托古托洋思想正是他们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见证。梁启超同时还说要“以古证今”、“以中证洋”，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照搬古人和洋人，因为那样会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也难使国人接受，而是要借古人之名以证今学、借中学之名以证西学。其所谓的“为体”、“为用”亦基于此。而这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说法如出一辙。同理，毛主席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同样既取法古人，其最直接的由来为岳麓书院的朱熹匾；也取法苏联，即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佳注脚。

源，并鉴于学界对此关注、讨论较多，我不妨就较为遥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悠远的由来和我较为熟识的、近前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两个源头略作评议。

首先，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直接受惠于东学，具体说来是借助了阿拉伯人“百年翻译运动”的东学西渐。阿拉伯帝国形成伊始，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便致力于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作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环节，他们大量引进东方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其中就有我国的“四大发明”，尤其是对文明传播起到重大作用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造纸术源自中国。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就出现了土麻纸。今新疆、敦煌出土的文物表明，公元四世纪初的西域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古纸，特别是一些粟特文书可以见证其广泛应用程度。据考，怛罗斯之役使大批中国俘虏集中在撒马尔罕和库法两地，其中在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就曾将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并由阿拉伯人于公元八世纪将其引入阿拔斯王朝。后者当即在巴格达创建了中东第一座造纸厂和第一座印刷厂。穆斯林书商蜂拥而至，图书馆也相继涌现。这些都使得文化的迅速传播成为可能。

这种传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百年翻译运动”。其实自伍麦叶王朝起，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古波斯、古叙利亚和古希腊罗马典籍，及至阿拔斯王朝形成规模。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在位）、哈伦·拉希德（786—809在位）时期，巴格达当局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组织学者翻译各国典籍，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星相学、宗教学、哲学、历史、艺术、数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人文和自然科学。著名的寓言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便是这一时期从梵文（《五卷书》）移译和改编成阿拉伯语的。许多至今仍在沿用的技术词汇，也是阿拉伯人传承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如阿拉伯数字、代数和零的概念。公元九世纪初，阿拔斯哈里发麦蒙（813—833在位）建立“智慧宫”，更是将翻译运动推向了高潮。“智慧宫”类似于中国古代大型的佛经翻译场或翰林院，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智者们进行图书编撰、写作、研究或翻译。一时间，各方学者、翻译家辐辏云集，学术活动盛况空前。他们注重收集和翻译被征服民族和周遭民族的文化典籍，肩负起了拯救和传播古典文明的任务。古希腊哲学在欧洲中世纪几乎被西方遗忘，却被大马士革（伍麦叶王朝首都）、巴格达（阿拔斯王朝首都）、科尔多瓦等伊斯兰都市大量收藏，并被移译至阿拉伯语和拉丁文。同时，阿拉伯人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和传播，他们还掺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和宗教思想，进而为中世纪后半叶西方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生发奠定了基础，并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巴格达学派”，以取代“亚历山大学派”。“巴格达学派”与科尔多瓦和开罗学术形成东西互动，从而激活了沉睡的古典

学术，点燃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导火线，成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引擎。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从一度被阿拉伯人局部或大部占领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端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人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但丁、薄伽丘或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巨匠耳熟能详，但对西班牙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情况却知之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作为近代欧洲最早的帝国，其崛起之后的保守姿态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它的作用；另一方面，它的盛极而衰和阿拉伯人的东方基因又使它一度游离于西方。然而，倘使我们翻检历史，便能轻易发现，不仅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大发现大都由西班牙天主教双王资助^②，而且连明朝晚期的不少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庞迪我等也是由西班牙直接或间接支持的。^③在文学领域，伊塔大司铎的《真爱之书》、胡安·马努埃尔的《卢卡诺尔伯爵》等显然也因西班牙的没落而被低估了。它们对薄伽丘、莎士比亚乃至安徒生等诸多西方作家的贡献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降，尤其是到了新世纪，但丁、伊塔大司铎、胡安·马努埃尔、薄伽丘，乃至塞万提斯等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巨匠同阿拉伯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东西方学界的关注，这就给西方崛起的东方因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鲜明注解。也就是说，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受惠于阿拉伯翻译运动，从而“以古证今”；而且借助于阿拉伯人和航海大发现，展开了大规模的“以西证东”。这种“古为今用”“东为西用”曾牢牢地为西方的崛起奠定了文化的和物质的双重基础。或可说，没有东方贡献、东方智慧，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三

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古”和“洋”两大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古印第安文学文化资源和同时期西方文学文化资源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赖以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两大基石。

首先，魔幻现实主义是拉丁美洲作家从集体无意识，尤其是从印第安文化中发现的“神奇”。用早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话说，“魔幻现实是这样

① 参见宗笑飞《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② 在此，指南针和火药（及西方早期热兵器）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这背后自有西班牙觊觎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事实上，自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西班牙（及其驻菲律宾历任总督）从未放弃过觊觎我中华大地。参见Torre Villar, *La expansion hispanoamericana en Asia XVI-XVII*,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0, pp.768-879。

的：一个印第安人或混血儿，居住在偏僻的山村，叙述他如何看见一朵彩云或一块巨石变成一个人或一个巨人……所有这些都外是村人常有的幻觉，谁听了都觉得荒唐可笑、不能相信。但是，一旦生活在他们中间，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故事的份量。在那里，尤其是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地方，譬如印第安部落，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幻觉印象能逐渐转化为现实。当然那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但它是存在的，是某种信仰的产物……又如，一个女人在取水时掉进深渊，或者一个骑手坠马而死，或者任何别的事，都可能染上魔幻色彩，因为对印第安人或混血儿来说，事情就不再是女人掉进深渊了，而是深渊带走了女人，它要把她变成蛇、温泉或者任何一件他们相信的东西；骑手也不会因为多喝了几杯才坠马摔死的，而是某块磕破他脑袋的石头在向他召唤，或者某条置他于死地的河流在向他召唤……”^①

其次，魔幻现实主义又是超现实主义的翻版，一定程度是对超现实主义的借鉴与背叛：“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反作用……它最终使我们回到了自身：美洲的印第安文化。谁叫它是一个耽于潜意识的弗洛伊德主义流派呢？我们的潜意识被深深埋藏在西方文明的阴影之下，因此一旦我们潜入内心的底层，就会发现川流不息的印第安血液。”^②用卡彭铁尔的话说，“对我而言，超现实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启发我观察以前从未注意的美洲生活的结构与细节……帮助我发现了神奇的现实”^③。说得更为明白一点，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的所谓魔幻或神奇现实其实是美洲印欧混血人种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发现不仅受惠于超现实主义的刺激，而且是拉美文化寻根运动的直接衍生物之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围绕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拉美文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鸣。以巴斯康塞洛斯、博尔赫斯、雷耶斯为代表的欧化知识分子（姑妄名之）鉴于美洲的种族和文化混杂，津津于无边的世界主义（或谓宇宙主义），从而致力于淡化民族意识，对一切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来者不拒的包容姿态。反之，以雷布埃尔塔斯、里维拉和土著主义作家为代表的左翼阵营则针锋相对，指宇宙主义或世界主义是掩盖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的虚无主义。有关争鸣在拉美文学史上被泛称为“寻根运动”，而魔幻现实主义正是在这场论争中脱颖而出的，它基本上取法折中，即既关注印第安传统，也不排斥欧洲文学文化，通古今而化异同：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当然，其所呈现的恰恰是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积淀的集体无意识。顺便说一句，拉美“寻根运动”颇使人联想二十世纪二十

① G.W.Lawrence, "Entrevista con Miguel Angel Asturias", in *Nuevo Mundo*, I (1970), pp. 17-23.

② Carpentier, *Confesiones sencillas de un escritor barroco*, La Habana: Editorial Letras Cubanas, 1964, p.32.

③ Luis López Alvarez, *Conversaciones con Miguel Angel Asturias*, Guatemala: Ed. Article, 1974, p.81.

年代我国文坛的潮起潮落和鼓角争鸣。也正因为如此，从拉美“寻根运动”到改革开放伊始我国文坛由心化境、一呼百应的“寻根文学”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只不过，后者囿于历史和政治原因而来得晚了一些。

结 语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借南宋陆九渊之意，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①（此言常被讹传为“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诚哉斯言！需要补充的是，这里至少还应有化与变的区别。相对于一个“变”字，钱先生显然更倾向于一个“化”字，譬如他关于文学翻译的化境说^②和关于文学比较的会通说^③流布甚广。但事实上现代文学有许多人为的变易或断裂，譬如西方现代派的种种极端做法。这一点无须多言。好在二十世纪末至今，现实主义的回归又恰恰证明刻意的、片面的求变求新并未将文学引向康庄大道，相反倒是喝住了不少读者。而这其中的否定之否定却是必然的，并且引人深思。当然，历史和现实永远不会完全重合，就像赫拉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即“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文学可以同时面对二重，甚至多重资源：南北西东，古往今来。这才是大化世界需要的同心圆，反之亦然。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 玲

①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93年，第5页。

②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中国翻译》1985年第11-12期。

③钱锺书认为文学影响学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理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在缺少时空关联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学现象，并对其进行平行研究；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通门户而化町畦”。详见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8页。